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间隔年”不是对生活的一种逃离,而是因自觉意识才主动去实施的一种行为,其目的是使学生想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强化其个人意识,从而使他们真心诚意地进入学术世界与高等教育领域。

再谈大学“间隔年”的意义

■郭英剑

“间隔年”是对现实生活的逃离吗

三年前的2016年5月26日,我在本专栏发表了《大学“间隔年”的意义何在》一文,着重谈了何谓大学“间隔年”?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间隔年?间隔年对于大学生的意义何在?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应该如何看待间隔年?后来,有多家媒体采访我,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促使我对“间隔年”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有媒体称,他们之前采访过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这些教授表示,选择间隔年主要是因为知道大学毕业后又要承受很大压力,间隔年可以尝不一样的生活。为此,有记者问我,您同意他们是要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出来吗?

我对此的回答是,如果记者在采访时没有理解错,那么,这里所提到的香港大学对于“间隔年”的认识,其实是对“间隔年”的一种误解。当然,这也可能是被采访者的个人感受,或者是香港的一个个别情况的反映。我认为,即便真的如此,它也不能完全反映我们通常所说的“间隔年”的意义。

因为所谓间隔年(gap year,也称sabbatical year),一般就指两种情况,一种是高中毕业被大学录取而延后一年入学的空档期;一种是大学毕业之后,被研究生院录取而延后一年入学的空档期。如果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段时间是不能称为“间隔年”的。

换句话说,“间隔年”通常指的是因自觉意识而主动去实施的行为。它绝非是对现实生活的逃离。通过间隔年,可以使自己想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强化学生的个人意识,从而可以使他们真心

诚意地进入学术世界与高等教育领域。这种个人意识的培养,是其思想和身心成长的结果,也对现实生活以及未来职业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我曾经把这称之为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对于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的人来说,无论是出了中学校门进入大学校门,还是出了大学校门进入研究生院大门的人,其间有一年甚至两年的间隔年时间,会对个人包括高校乃至社会都有很好的影响。

以大学毕业之后的“间隔年”为例。现在读研究生院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想清楚为什么要读研的人,就我平时所接触到的学生来说并不多见。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年认真思考,并想清楚为什么要读研至关重要。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对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努力奋斗的内在动机自然大有益处,同时,也为进入研究生院之后尽快转换角色并努力学习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

美国高校鼓励学生选择“间隔年”

在美国,很多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都鼓励学生利用间隔年与社会接触。因为这只是学生高中毕业后与上大学前的一种自由学习方式,与大学本身并无太大的关系。高校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排好因不能按时来上学所造成的人员缺失与住宿等相关事宜,其他倒未见有具体的制度与规则。虽然目前政府支持有限,但一些社会机构(主要是民间私立的文化教育机构等),比如AGA(American GAS Association)为此会提供一些类似于科研项目、奖学

金与助学金,用于学生申请。

就美国而言,目前尚没有一个具体数据说明每年有多少人选择“间隔年”。但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现在每年选择间隔年的学生越来越多。在美国名校特别是研究型名校中,大约60%的人会选择间隔年。一般医学院的学生,大约有50%的学生会选择间隔年。根据《华尔街时报》报道,90%选择间隔年的学生都在一年之内进入大学。根据美国AGA2015年的统计,他们的相关成员在当年为选择间隔年的同学提供了总计约280万美元的奖学金与助学金。

在相关统计中,几乎所有选择了间隔年的学生都对间隔年的经历感到非常满意。在统计中,大家对间隔年意义的评价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对于我是谁、什么对我更重要有了更多的意识;让我对其他国家、人们、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让我学到了对于未来职业有帮助的技巧,以及对所要学习的专业有了更多的认识。

“间隔年”如何实现“本地化”

从目前看,国内较少看到间隔年的相关报道与材料。据我个人观察,有三个原因:第一,整个教育界,特别是基础教育群体,包括社会公众特别是家长与社会机构,都对间隔年了解不够,认识不清。第二,国内高校对间隔年的意义同样认识不够深入。未能意识到间隔年对于高中生到大学期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三,国内高中和高校教学体制以及整个机制不够灵活。间隔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协调

并真正去实施,才不至于给实施间隔年的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间隔年”要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我的建议很简单,即中国高校要探究并逐步倡导“间隔年”制度。要想在中国倡导这样的制度,首先,对间隔年要有了解——其实这很简单,不复杂。其次,要对此作出制度性的配套方案——这不容易。再次,要让学生对此有认识,包括学生家长都能够有所认识,并最终使人可以接受——这需要时间。只要高校在这方面有所认识、大力推行,未来社会的接受、相关机构组织的认可与接受,也会随之而来,它们会自行调整招聘规则等。

就大学而言(研究生层面相对容易),主要是高中与大学之间的沟通联系与衔接,包括招生过程、课程设置、后勤安排等方面方面的协调。美国许多高校在鼓励间隔年的时候,出台了相应的“间隔年”项目,并且把这些“间隔年”项目列入其课程计划之中,从而使得这些项目更加具有针对性。高中生如果按照这样的课程计划去进行自己的间隔年,就不是盲目地到处旅游。到上大学的时候,这门课程就已经完成了,可以拿到相应的学分。而在一些高中,设有专门的辅导员,负责指导那些有意申请“间隔年”的学生。这些都是需要中国高校学习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间隔年”并不是非要出国才行,它完全可以在国内进行。比如生活在内地的人,可以选择到海滨城市;生活在海滨城市的,可以选择到西南边陲;城市的学生,可以选择到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走一走,看一看,或者去担任志愿者,相信这样

的经历对于他们会有极好的影响。

中国高校如何制定配套制度

当下,中国高校尚未有允许学生参与“间隔年”的配套制度。我的建议是:

第一,中国高校应该重视间隔年的目的与意义,认真研究国外间隔年实施后高校的配套做法。其实,这样的制度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大学生入学的计算、当年的宿舍安排等基本问题。

第二,在有了相应的制度后,应该鼓励高中生选择间隔年。有了此种经历的大学生,将会与从校门到校门的大学生有很大不同。

第三,从社会的角度看,也应该宣扬间隔年的意义,使高中生、学生家长也能够了解间隔年的目的,从而使大家意识到间隔年的重要性,进而才会有更多的人将其作为未来选择或者至少不会拒绝间隔年。

现在,人们对于“间隔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无论认为它是长期旅行,还是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实践,抑或是一种自我精神救赎,我都认为未能很好地涵盖“间隔年”的意义。其实,“间隔年”既没有这里所说的那么随意——仅是一种旅行,也没有那么正式——是一种社会实践,更没有那么高尚——是什么自我精神救赎。在我看来,简单地说,“间隔年”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走出课堂、游历四方的“游学”,在看似游玩之中学习,但又在这种学习之中去体验人生,开阔视野。

总之,间隔年既不高大上,也并非毫无意义。但只要做得好,一定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也会有益于中国的高等教育。

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十个要素

■黄涛 胡雅洵

美国硅谷之所以能诞生一大批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硅谷的成功,根在人才,起于技术,成于资本,创造了富有硅谷特色的“创新—创业—创富”三级跳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科技引领创业,创业驱动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体制机制,其实质在于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

一流的高等院校:提供创新源头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诞生的摇篮,该校对于硅谷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硅谷内约60%-70%的企业由斯坦福大学的师生携手创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硅谷“附近两所大学的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和大学毕业生在建设充满活力的新创办公司中起着重要作用。好的大学也许是发展新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

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太阳微系统(SUN)、硅图(SGI)和思科(Cisco)。太阳微系统的英文SUN就是斯坦福大学网络的缩写。硅谷周边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注重理论创新及工艺创新,并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证了理论创新成果能够第一时间投入生产实践,形成科技公司高管和高校教授之间的深度交融、学校与企业的高校双赢局面。

丰富的人才供给:确保创新源泉

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和充足的人才资源储备是硅谷成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核心要素。硅谷集结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达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任职的就有近千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达30多人。硅谷也是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创业最集中的地区,其中华裔和印度裔创办的高技术创业企业占到美国硅谷企业总数的23%。在硅谷有这样一种说法,“硅谷就是由IC组成的。这不是指集成电路,而是指印度人(Indians)和中国人(Chinese)。”在硅谷的技术人员中,亚洲人占60%,高技术人才中有33%是海外人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技术移民是连接硅谷和世界各地高技术(产业)中心的纽带。

同时,硅谷也是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区,硅谷人才流动比率是30%,适度

的人才流动可以使企业增加活力,并建立起各自广泛的人际网络。除了大量高精尖的科技创新型人才外,硅谷还拥有大量极具慧眼的伯乐实业家,他们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认真筛选识别每个出色的技术成果,并快速争取到风险投资以保证有市场前景的发明能及时投放市场。

灵活的组织结构:结成创新联盟

硅谷企业的组织结构灵活,人员容易流动,企业组织依照适者生存的规则随时形成一个新组织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硅谷采用的是一种扁平的分权网络结构,硅谷企业根据不同的具体工作来确定组织结构,大多数采用分散联系的班组结构,积极鼓励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以保证生产效率。

硅谷企业与周边的大学、同行公会等联系紧密,与竞争者进行良性竞争并结成联盟,形成开放性、网络型的组织结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也通过非正式交流进行合作,共同创新,人才不仅仅为一家实体公司提供服务,而是为一个虚拟的大公司——硅谷服务。

独特的硅谷文化:形成创新氛围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创造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环境又培育了创新的人才。硅谷的文化给予创业者以最高的敬意。萨克森宁说:“该地区的文化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一位创业者这样描述这种文化:“这里的新公司动作要很快。硅谷的文化是一种变革的文化,同业压力和社会压力支持冒险。”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对硅谷技术创新活动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硅谷文化中鼓励创新,积极支持创业,不以失败为耻,大大激发了员工的探索冒险的创新热情;在严密公正的法律体系下,硅谷企业崇尚竞争,讲究公平,同时鼓励企业人员之间交流,尊重对手;硅谷文化注重知识共享,看重团队精神,鼓励人才不断突破自我,容忍人才跳槽,支持鼓励人才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

协同的创新机制:整合创新要素

协同创新是硅谷有效整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创富”的技术、人才、资金、组织、网络、环境等各要素资源,并进行功能集成的最佳模式。在这个协同创新体制中,市场需求是导向,企业是创新主体,大学是产业思想库、人才库和创新之源,用户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扮演着

“育婴保姆”和“特殊用户”的角色,共同利益则是这个协同创新体制形成的基础和纽带。创新型企业家、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服务型企业等紧密连在一起,演化出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

充裕的风险投资:助推创新创业

硅谷创新创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拥有以“功能全面、运行规范、发展成熟、专业性极强”为主要特征,由创业者创办的风险投资企业,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和风险投资机制。

硅谷的融资机制是一个系统,涉及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前融资的多个环节,尽管目前硅谷存在微软、苹果及惠普等大公司,但硅谷的创新主体还是众多的小型创业企业。新创建的小型公司由于要增添设备、招募人员等需要投资,但由于没有可靠的担保,一般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帮助,企业唯一追求成功的途径便是寻找风险投资。充足的风险投资资金是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全美国70%以上风投公司都在硅谷设立办事处。

合理的政府干预:服务创新需求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大型的科技创新项目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同样硅谷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适当的政府行政干预对于硅谷整体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以及快速发展也非常重要。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满足迎合科技公司的需求,使科技公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首先,来自政府的订单对硅谷新技术的扩散影响重大。在硅谷形成初期,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对尖端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才使许多年轻的高科技公司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

其次,政府通过研发投入和相关政策促进硅谷技术发展。政府对符合国家科学发展需要的研发给予直接的资金与各方面的投入。

此外,政府严格实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促进了技术交易市场的建立;建立行业标准,推进科技的完善与进步;制定了宽松的技术移民签证,实施专门为吸纳国外人才的签证计划,增加签证发放的数额;为硅谷的扩展提供规划用地。

充分的市场竞争:尊重创新规律

硅谷是世界每年新增企业数量最多的高新科技产业园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公司拔地而起,也有成千上万的公司黯

然倒闭。有关数据显示,在硅谷能够存活十年以上的公司只占10%,成活率非常低;10%-20%的公司能够存活3-5年。这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硅谷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市场竞争非常充分,其运作机制完全市场化。

硅谷企业往往把技术人才的发明同商业资本结合起来,将最优秀的人才、最充足的资本以及最新的技术成果等资源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整合优化,最后投向市场,接受大众的评判。正因为拥有如此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让不计其数的人才前赴后继地来到硅谷,潜心创业,才让无数企业从默默无闻变成家喻户晓。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创新成果

硅谷的成功同样得益于美国完善的司法体系,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为硅谷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法律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硅谷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园区,每天都会产生数以千计的科研创新成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保护,如快速申请专利、通过技术转让机构网络促使科研成果尽快投入生产进入市场或允许大学、科研机构、非营利机构和企业拥有联邦资助发明的知识产权等。完善的法律体系一方面保障了进行创新的个人或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创新型的人才或企业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有助于硅谷更快更好地发展。

完备的孵化功能:配套创新服务

硅谷能够诞生成千上万的高科技公司,是与一系列专业化分工与发达的服务体系分不开的。

在硅谷,具有创意或技术的发明家,无需本人直接去做企业生产经营的事,可以从各种专业公司那里得到流水线式的相应服务。硅谷形成了以“网络化、社会化、产业化、模块化”为主要特征的发达服务体系,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咨询公司、清算公司等。这些组织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缩短了周期,刺激了创业者的创业欲望,提高了创业成功率。在硅谷,大小公司是互为平台的,大型企业会把诸多业务交给小企业有专攻“只做一件事”的5到20人规模的小企业分别运作,众多的小企业支撑着大公司的运行。

(黄涛,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胡雅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驱动下高等教育的改变

■保罗·巴斯普

如今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对于人工智能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任何一种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着许多问题,同样也会有许多机遇,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卓越教学峰会上,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官川茂就讲述了人工智能将会如何改变我们今天的教学和评估。

官川是创建OpenCourseware的团队的一员。OpenCourseware是麻省理工学院几乎所有课程内容的线上存储库。目前,官川正致力于将人工智能集成到学习系统中。

他表示,在一个高度依靠计算机辅助的世界中,传统的文科技能,如形成一个想法、传递交流等,会更加有意义。而在支持开发自动化培训系统,以训练相关能力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官川在会议上详细描述了人工智能系统如何使线上课程变得更加有效,“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识别出学生存在困难的领域,然后针对薄弱点,根据需求重复或加强这一板块的学习。”

除了在教学上,人工智能系统在评估中也大展身手。官川介绍道,目前,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在辅助评估论文质量这一重要教学沟通环节上证明了其实力,它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给人类教师们带来了挑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评估中会产生一些偏见,精准地指出教师们需要强化、学习的能力。

“未来让学生通过这类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大规模学习沟通、表达的技能,这一点并不难实现。”官川说。

此外,官川还特别强调,在让学生学习技术的同时,还要教授他们伦理道德。在人工智能的伦理定义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教授学生们足够的伦理道德知识,以至于不会迎来AI带来的世界末日,使人工智能永远地服务于人类。

官川还提到,如今广大公众担心,在教育甚至更多的领域中

计算机的应用可能会使一些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表示,在过去人类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在不断寻找并改正错误。但是计算机的存在,将会大大增加错误的演化速度和影响,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来说是压倒性的。

“这一点是非常恐怖的,目前即便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很多科学家依然没能搞清这些先进的计算机系统究竟是如何在他们环境中学习的。”但是,官川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完全指导控制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制,实质上就意味着程序员们处在调控决策整个社会的位置,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达不到上述程度。

官川表示,“我的计划是教育新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在拥有计算思维的同时,有一种敏感直觉,在发生一些事情时,他们脑中至少有概念,知道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也要教导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明白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因为人性并不完美。

(作者系《泰晤士高等教育》编辑,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全景网